

走出文革連載 32

走出文革

煤油燈下的報告

(接上一期)

辛德勒能够拯救一千多個猶太人，除了他的良知和智慧外，同他在納粹德國有一定的社會地位有關。而此時的王醒民却已被打入社會的最下層，他並無力量去拯救蒼生。然而他的良知和智慧使他比我們更早地認清那個時代的荒謬和毛澤東發動文革給中國帶來的災難。

他為自己的良心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我和王醒民都是工程力學數學系的學生，同一年級但不同班。他讀的是計算數學專業，文革前我們祇有幾面之交。給我深刻印象的是：在嚴寒的冬天，他每天早晨都會在學生們共享的洗臉間赤膊洗冷水浴。

1966年8月初的一個晚上，我在大禮堂前看大字報。文革初期那裏曾是大字報最集中的地方，所有重要大字報的發表都將它作為首選之處。但因很容易被覆蓋，每張大字報的存活時間祇有兩三天。為了便於學生挑燈夜戰，大字報欄上掛滿了燈泡。雖然比不上今天霓虹燈下的南京路，倒也燈火通明，人來人往，十分熱鬧。

當時，清華黨委垮臺了，工作組撤走了，紅色恐怖和武鬥之類殘害生靈的醜惡行爲也還沒有發生。在這短短的十幾天沒有威權和武力的“黃金時段”，學生們的想法和行爲處於空前的自由狀態，一個個熱血沸騰，激揚文字，為追求真理而各抒己見。就連我這個已被批判的修正主義苗子和準反革命分子，也無人敢阻攔我書寫大字報。但我必須在自己的名字上用紅筆打上三個×，以示我和革命群

衆的區別。我自己不打，大字報貼出後，也會有好事者替我補上。

就在那個晚上，王醒民走到我這個名字被打上紅叉的人面前。站在大禮堂前的臺階上，他告訴我工作組在校時他是數力系“批判葉志江寫作班子”的成員。

他被分派的任務是批判我的成名成家資產階級思想。工作組交給他一本我編寫的《學步拾遺》筆記本，作為他批判的靶子。但他在讀了我為《學步拾遺》寫的序後，却認為無錯可批。不僅無錯，他還說了一些贊揚我的話。

我在被批判後幾乎成了“孤家寡人”，無人敢接近我。王醒民對我表示的同情和肯定令我感動不已。

從此，我們的友誼一直保持到今天。

第二天，王醒民將我那本被工作組沒收的筆記本物歸原主，使我有得以保存筆記本中這段被批判的文字：

《學步拾遺》序

編輯《學步拾遺》這一集子可以算是我幾個月來的“夙願”了，在6月10日的讀書日記中就已記載了自己的這一想法。祇不過那時給它取的名字是“專題研究集”，後來仔細琢磨了一下，覺得目前草擬的幾篇文章（指《火箭飛行的數學原理》、《微積分的力學基礎》和《解不定方程的析因子法》等）談不上是什麼專題，更不是什麼研究了。想起已故學者杜國庠在《便橋集》序中曾把自己的文章比作給青年讀者架的“便橋”，並且說“一俟更好的鋼骨水泥的乃至全鋼結構的橋梁建造出來的時候，便可毫不惋惜地棄置或拉雜摧燒了它。”這種謙虛的精神實足讓我們奉為楷模。然則我的文章不僅算不上什麼便橋，即使稱之為獨木橋也實在

是受之有愧的。這些東西祇能算是老婦、弱兒在收割過的麥田裏撿到的一二顆麥穗而已，因此就給它另起了“拾遺”這一名字。

然而，繼之又想到科學家們在獲得成功之後，也往往謙虛地把自己的成功比做是偶然拾到的東西。牛頓不就曾說過：“我所做的祇是像一個頑皮的孩子揀拾了一些光滑的石子和美麗的貝殼，而未被發現的真理還像汪洋大海一樣在我面前。”以此一比，我的東西豈能再稱“拾遺”？簡直連棟破爛都不如了。但是如果在封面上大書“棟破爛”三字，也實在是斯文掃地。唯一的辦法是在“拾遺”前面加個定語來限制一下拾遺的含義，以便有別於學者們的“拾遺”。而我與那些學者的最大區別在於，我還是一個剛剛開始學習走路的人，而他們則已經是以巨大的速度追逐真理的健將了。因此，他們的拾遺可以其所跑的距離來確定為“百米拾遺”，“萬米拾遺”，甚至是“馬拉鬆拾遺”等等。而我自然祇能定名為“學步拾遺”了，這也就是“學步拾遺”四個字的來歷。

看到這裏，也許有人會提出這樣的批評：既然這些文章沒有什麼創作價值，又何必必要煞有介事地寫成專題形式呢？這豈不是辱沒斯文！

這意見恐怕也是有些道理的。一祇小小的螞蟻四處奔波，千辛萬苦地覓得的食糧，往往是人們從牙縫剔出來的廢物。這些廢物對於高貴的人類來說當然是不屑一顧的，大可不必如此興師動衆。然而殊不知，這在螞蟻看來却是無價之寶，自然要小心翼翼地珍藏起來。這裏固然有著弱小生物和人類之間的差異，而同時又何嘗不包含著“敝帚自珍”的深意呢？論常

情，人們對於自己的點滴心得總是愛不釋手的，盡量用最莊嚴的詞句來描述它，即使這會觸犯某些清規戒律，那也顧不得這許多了。

從另一個意義上來說，我們在求學時期就應該開始培養獨創的能力。而這種能力又絕不是什麼上帝所賜，而是要靠自己一點一滴地積累起來的。但是如果現在將思想中冒出的一些微弱的星星之火都看成是區區“小數”，不加整理、發揮的話，又怎麼能在將來爆發出絢爛的創造之花呢？撇開這些不談，即令自己一旦真正有了學識，再回過頭來看看這些幼稚得可愛的文章，不是也會露出由衷的微笑而緬醉于往事之中嗎？

是的，人總是由小變大，由弱變強，由蹣跚地學步的孩童而變成向世界紀錄衝刺的勇士！

1962年9月6日于燈下

文中用下橫綫劃出的一部分文字是當時工作組用鉛筆劃出的，作為重點批判的內容。

我全文錄下這段文字，是為錄下那個時代的荒謬。

一個十七歲的少年，被發現得了肺結核而失去上大學的機會。9月6日，正是昔日的同窗好友與高采烈地走進大學校門的日子。在昏暗的燈光下，他滿懷心酸但又充滿信心地決定通過自學去獲取知識。然而，他當時寫下的這段誓言般的文字，日後竟成了批判的對象。

今天，當我緬懷于往事之中時，露出的恐怕不是由衷的微笑，而是含淚的微笑。

在這次談話之後，我和王醒民便經常在一起。他和我一起炮打康生，一起編雜誌，一起到呼和浩特印書。在搜查孔原家時，他不走尋找康生的字畫，而是捧着一本香港《明報》雜誌津津有味地看起來



本報特約作家 葉志江

了，還說“要帶回去研究研究”，因為那幾期《明報》連載着毛澤東和劉少奇分歧的來龍去脈。經我批准，這幾本雜誌也被列為康生“罪證”帶走了。

有一陣子他和清華大學水利系學生邊國政過從甚密，經常在我面前推崇邊的才華和思想。

這邊國政也確實是一個奇人。他從東北考上清華，在大禮堂參加蔣南翔等校領導出席的迎新大會後，給中學同學寫了一封信。他在信中描述校領導走上主席臺時心中的感受：“這時候，全場奏起了軍樂，校領導魚貫而入，一個個肥頭大耳，儼然中央首長一般。校領導就座之後，樂隊停止了奏樂。全場鴉雀無聲，安靜得哪怕是一根針掉在地上，都可以聽得見。那時候，我真想放一個屁，放得山響……”

一個多月後，他參加天安門前的國慶游行。當游行隊伍經過金水橋時，毛澤東在城樓上向群眾揮手致意，全場歡聲雷動。而在給同學的信中，邊國政又嘲弄了游行群眾的盲目狂熱：“我們揮酸了金臂，喊啞了銀嗓，祇換得毛主席揮了三下手。”（未完待續）

民國風雲錄連載 9

民國風雲錄



本報特約作家 陳志輝

節選七 獨立求索

在北伐戰爭的狂濤巨浪中，僅有5到6歲的中國共產黨開始努力擺脫蹣跚學步的狀態，不願再盲從共產國際的一切指示，試圖根據自己的理解來從事革命活動。在北伐軍攻占武昌之後，中共的工作大體分為3個方向：一是直接參與北伐戰爭；二是在軍閥統治區組織城市武裝起義；三是大力開展農民運動。

這3個方向中，祇有第一個方向完全符合共產國際的指示。可是，中共總書記陳獨秀對直接參與北伐戰爭並不熱心，靠的是各級黨員的自覺投入。在這方面的最大成績是向北伐軍中派遣了一批中共黨員，包括軍事骨幹和政工幹部。

陳獨秀為首的中共主要領導人把工作的重點放在了第二個方向上，即組織城市武裝起義。這本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一個重要方向，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都是經

典的例子，然而共產國際並不主張在中國這麼搞，把賭注都壓在了國共合作的北伐戰爭上面。中共中央則學着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理論，將中國革命的希望放在了工人階級身上。盡管中國產業工人的比例很小，但是他們找到了人數相對集中的大城市，上海作為中國最大的工業城市，理所當然地成為了中共中央工作的重點區域。在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以廣州為大本營後，中共中央的領導機關始終堅守在上海，就是這一指導思想的體現。

現在機會終於來了。上海作為東南軍閥的最大城市也是最大的戰略目標，舉行巴黎公社式的武裝起義正好能配合北伐軍的進攻。早在去年10月23日，為了配合浙江省長夏超的起義，上海工人發動了第一次武裝起義，然而隨着夏超部隊的失利，這次起義也被鎮壓了。到今年2月22日，上海工人再次發動大罷工，很快轉變成武裝起義，但還是没能成功，又一批革命義士倒在了血泊當中。

陳獨秀等人認識到，武裝鬥爭需要軍事領導經驗的人來指揮，於是他們想到了周恩來。周在黃埔軍校當過政治部主任，作為第一軍黨代表參加過東徵戰役，並且直接領導葉挺獨立團內的黨組織，可以說在中共領導人中最有軍事方面的資格。于是在第一次武裝起義失敗後，就調周恩來從廣州赴上海。

1927年2月23日，即第二次武裝起義失敗的一天後，中共中央、中共上海區委舉行聯席會議，決定成立特別委員會，由陳獨秀、羅亦

農、趙世炎、汪壽華、尹寬、彭述之、周恩來、肖子璋組成；並決定成立以周恩來為首的特別軍委，準備進行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當武裝起義發動時，周恩來擔任了總指揮。

在總結了兩次起義失敗的教訓、準備充分之後，由上海市總工會發布了總同盟罷工的決定。3月21日，上海80餘萬工人舉行總同盟罷工，接着轉為武裝起義。面對直魯軍閥的3000多人的軍隊和2000多名警察，工人糾察隊和廣大罷工工人一起投入戰鬥，切斷敵人的水源和電源，向各區警署、兵工廠、電話局、火車站以及直魯軍發動全面進攻。經過兩天一夜的血戰，最後一個據點火車站也被攻下，于22日獲得全面勝利。他們隨即召開了上海市市民代表大會，成立上海特別市市民代表會議政府。

第三次武裝起義能够成功，雖然主觀的正確指揮功不可沒，但客觀上跟北伐東路軍的進攻有直接關係。3月20日，白崇禧的部隊已經逼近了上海。21日，東路軍攻進市郊，直魯聯軍腹背受敵，軍心已散。3月22日，北伐軍開進已起義成功的上海市區，受到了廣大市民的夾道歡迎。

中共工作的第三個方向，是大力開展農民運動。這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是一個創新，因為按照過去的理論，農民從整體上不是無產階級。這個運動的核心組織是為農民謀利益的農會，第一個搞農民運動的是廣東海陸豐的彭湃。彭湃的父親是大地主，母親周鳳却出身于貧苦家庭。10歲時父親病逝。他1917年前往日本留學，就讀

于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科，在此期間轉變成社會主義革命者。1921年夏回國，翌年開始從事農民運動。為發動、組織農民和成立農會，他當眾燒毀自家祖傳田契，將自己的農田分給農民無償耕作，同時自己過着儉樸的農民生活，被民衆稱為“彭菩薩”。1923年5月廣東省農會成立，彭湃被推選為廣東省農會執行長，後來將其經驗寫成《海豐農民運動報告》一書。

但是，身為農會領袖的彭湃那時還沒有加入中國共產黨，無法參與中共的決策。而真正讓中共中央認識到農民運動重要性的，還是毛澤東。

毛澤東出生于湖南湘潭韶山的普通農家。1921年7月，他與同學何叔衡一道，代表湖南共產黨員，參加了共13位代表的中共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他回到長沙後不久，被母校第一師範學校聘為國文教員。在教學之餘，他領導中共湖南省黨組織的工作，一開始是遵循馬列主義理論搞工人運動的。他和同志們多次深入工廠礦山，吸收一些先進工人入黨。毛澤東在安源煤礦成立了中共安源支部，委派從法國留學回來的李立三擔任支部書記。

毛澤東在湖南掀起了工人運動的高潮，先後領導發動了安源路礦、粵漢鐵路、水口山鉛鋅礦和長沙泥木工人等一系列的大罷工。共10次罷工，獲得勝利及半勝利的罷工有9次，僅失敗1次。這些成績獲得了黨內的高度評價。

但是，毛澤東沒有被成功衝昏頭腦，他在考慮一個重大問題——中國工人階級太少，發展潛力有

限。同時，他注意到了彭湃在廣東開展的農民運動，於是產生了一個大膽的想法——在農民中建立共產黨組織。

時間到1923年6月，已是準備國共合作的氣氛了，中國共產黨決定在廣州召開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大會原來的核心議題是國共合作，討論同國民黨建立革命統一戰綫問題。張國燾對此表示反對，結果導致張犯了“左傾”錯誤，被排除在中央委員會之外。毛澤東因領導湖南工作成績出色，進入祇有5人的中央局，這一年他剛好30歲。

毛澤東在會上做了一個關鍵的發言。他向大會指出，湖南工人數量很少，國民黨員和共產黨員更少，可滿山遍野都是農民。因而他得出結論：任何革命，農民問題都是最重要的。他還證以中國歷代的造反和革命，每次都是以農民暴動為主力。中國國民黨在廣東有基礎，無非是有些農民組成的軍隊，如果中共也注重農民運動，把農民發動起來，也不難形成像廣東這樣的局面。這一新穎觀點引起了大會的轟動。

正因為有了這個提議，大會通過了一個由毛澤東和譚平山起草的《農民問題決議案》，使中共組織領導農民運動從此名正言順了。張國燾對此說過一句公道話：這是“這個農家子弟對於中共極大的貢獻”。由于會前大家沒有準備，因此在會上也不可能一下就部署如何具體組織實施。會後，毛澤東因擔任中央局秘書，不能離開在上海的中央局，無法親自去實踐自己的設想，但却一直將此挂在心上。（未完待續）